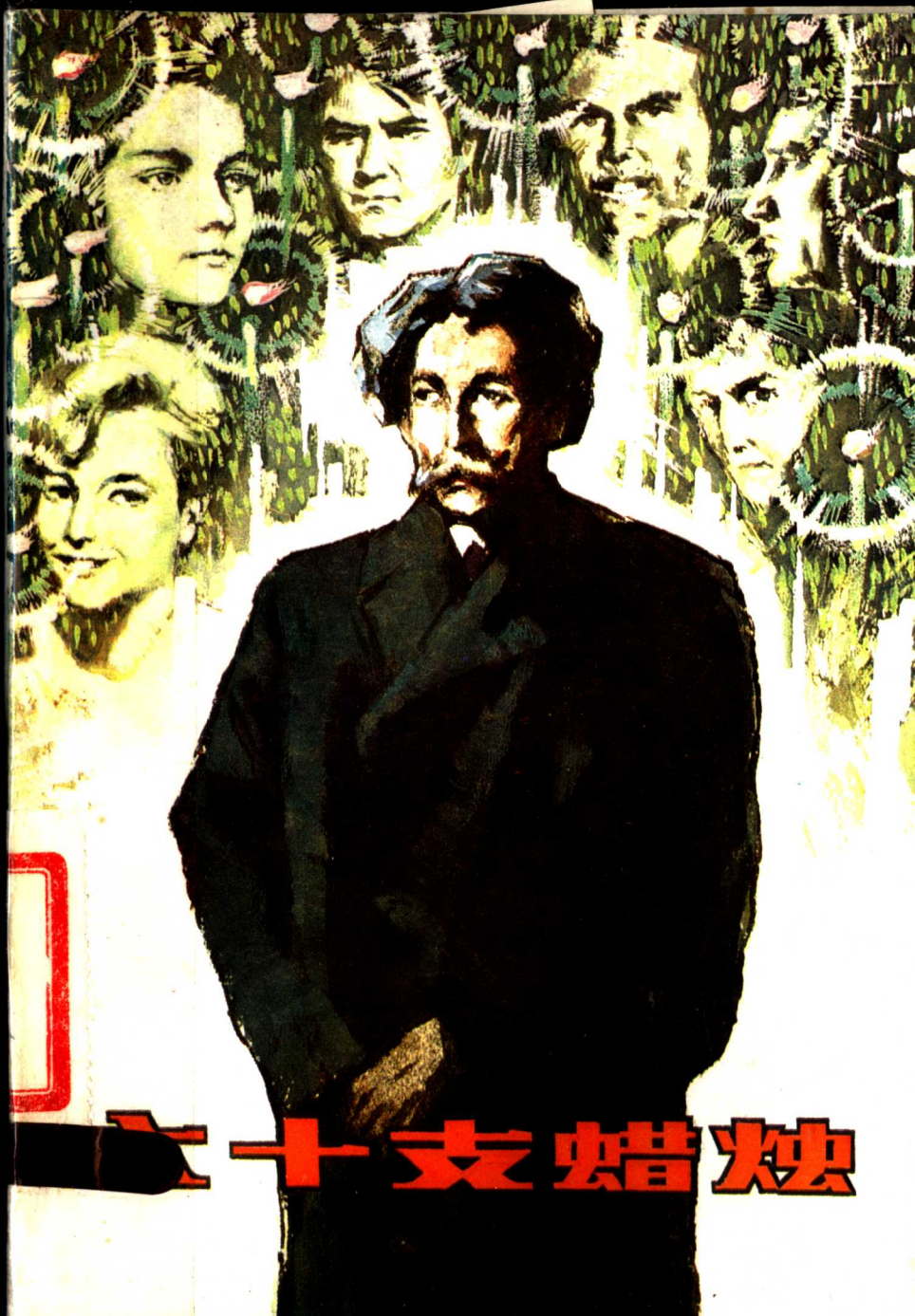




六十支蜡烛

I512.4/149

六十支蜡烛

〔苏联〕符·费·田德里亚科夫 著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 译



20844446



花 城 出 版 社

844446

六十支蜡烛

【苏联】符·费·田德里亚科夫 著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插页 120,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600册

书号 10261·70 定价 0.53元

内 容 提 要

《六十支蜡烛》是苏联当代有影响的作家符·费·田德里亚科夫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发表的一部新作。小说主人公叶切文是辛勤工作数十年的中学历史教员，他一生培养了许多学生。在他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摆着一个点燃着六十支蜡烛的生日蛋糕，人们纷纷向他祝贺。各地的学生还发来贺电、贺信。突然，老教员发现一封署名“您过去的学生”的匿名信，扬言要杀死他。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要杀他？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老教员陷入了沉思，逐一回忆了许多与他有关的人和事，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六十支蜡烛》反映了苏联教育界和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小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艺术风格也颇有独特之处。

“我们当中，有谁知道自己得罪过多少人……”

——K·恰彼克

—

大厅里的灯火熄灭了，闻名全市的“若尔卡三兄弟”餐厅乐队的鼓手、小提琴家和钢琴家奏起了庆祝乐曲。这时，一个点燃了蜡烛的大蛋糕，象一束热情洋溢的鲜花从泛着幽光的敞开的大门飘然而入，出现在庄严肃穆的黑暗之中。金粒似的摇曳跳动的烛火，隐约映在墙壁上的红光，变幻不定的玻璃吊灯的光影和上了年纪的餐厅服务员苏格拉底式大脑门上的反光，交相辉映……

六十支蜡烛点燃在生日蛋糕上。这景象何等壮观！

长着苏格拉底式大脑门的餐厅服务员把烛影晃荡的大蛋糕端到我的面前。我再次为这光辉夺目的景象感到惊讶不已：六十支蜡烛集中在一起！

昨天，还是个走在青春大街上的普通人，戴一顶灰色的

细毡帽，穿一件藏青色的长摆大衣，虽说年事已高，受人敬重，但也不到使食品售货员的女售货员在午间休息来临时刻，不敢在他的鼻子下把小窗口“乒”的一声关上的地步：“你们人那么多，可我就一个人！”昨天，我还是个普通教员，而这样的教员在我们城里有好几千。

今天，我们的市报在头版刊登了我的相片：相当可观的大鼻子，皱巴巴的颧颊，两道莫名其妙的皱眉头两簇灌木。六十年来，从没有人认为我有什么出众之处，可一星期前，大家突然觉得我不是个普通教员，而是个年高德劭的长者，是个在某一点上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公民。

我们卡拉辛诺，是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城市。多年来，它经历了迅速诞生和蓬勃成长的过程，它是在脚手架，难以通行的泥泞，以及由水泥板、到处乱放的铁管、一墩堆碎瓦片组成的混乱的建筑工地中生活过来的。末了，工地连同难以通行的泥泞，一起移到了郊区，城市象个样子了。也许，它还不能挤身美丽城市之列，但其他城市拥有的一切：带阳台、甚至带敞廊的高层楼房，临街突出的商店玻璃橱窗，宽阔、笔直的街道，红绿灯，画着斑马线的人行过道，系着白皮带的交通警，它无不应有尽有。城里有两座文化宫，十来家电影院，一个游艺站，一家享有盛誉的“水晶”饭店。饭店附有一个超现代化的舒勃尼科夫兄弟爵士乐队，大家管它叫“若尔卡三兄弟”。

卡拉辛诺市出现了。这对国内其他城市以及对它本身，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今，它只缺少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

英雄了。倒不是缺少起重机司机、挖土机手、安装工、泥瓦匠一类建设英雄，而是缺少英雄市民，英雄公民。

于是，我，一个普通教员，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切文，就成为英雄了。

我已年满花甲。市教育局给有关单位呈送了有关报告：建议庆祝我的生日，进行奖励并授以称号。可上面一位好寻根究底的同志，一看我的材料，就惊讶地说：

“对不起，这里写的是他出生在卡拉辛诺……”

“是的，他是本地人。”

“他六十年一直住在这里？”

“如果不算在师范学校学习那几年的话。”

“可这里写的是，四十年来他一直在学校教书。他在哪所学校教书？难道卡拉辛诺村过去有学校？”

“有过，而且，要知道，全俄国都闻名哩。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至今还存在着。”

原来，年轻的城市卡拉辛诺并非无亲无故，发现了一个它的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人和参加者。我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位始祖，它的第一个公民。

我的相片登在本市报纸上，许多著名领导人，本市的父母官们，也来到“水晶”饭店参加为我举行的祝寿活动。“若尔卡三兄弟”奏起了庆祝乐曲。

于是，六十支蜡烛集中在一起。一年一支。一年又一年，构成了我的一生。

二

庆祝活动结束了，刊登我的相片——灌木似的浓眉和白嘴鸦似的鼻子——的报纸已被遗忘。在这之后，我大概应该忧郁地宣告：“我又照老样子生活了。”

确实如此，是老样子。我和平常一样，七点起床，不慌不忙地漱洗，认真仔细地刮脸，在有病和虚胖的妻子家兔一样温顺的目光注视下沉思地吃完早饭。然后，我脱下睡衣，又不慌不忙地、仔仔细细地穿戴：先是在窸窣响的小领子下系好领带，再穿坎肩和由于多次水洗而显出一道道白印子的上衣，然后把戴了多年而仍未走样的灰色礼帽放到头上，最后穿上藏青色的大衣。虽然这是件旧大衣，但质地坚实，仍旧笔挺和相当沉重。

我居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我很少坐车。我喜欢在早晨不急不慢地步行去学校，几年来，在路上遇到的总是那么一些人……一个身穿制服式上衣的胖子，手持一根粗手杖，还蓄了莫泊桑那样卷起的短髭；一个身材细长，火红色小胡须的青年人，他的目光亲切而温柔，但不招人信任；一个鸭鼻子姑娘，总牵着一流口水的、精瘦的斗犬在散步。还有许多很难说出什么特征的人，但我记得他们，而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都记得我。

当我跨过学校的门槛，走进教室大楼前厅，经过举手致

敬的少先队员石膏像时，存衣处的大钟告诉我，此刻是九点差七分。

生日蛋糕上的六十支蜡烛燃尽了。一年一支。

不能说我从前完全不懂得自己的价值，不是这样！我是个不可少的人。但我的用处只相当于一枚螺栓，而这样的螺栓真是多不胜数。

但人们发现了我。原来，我还不象是个标准零件。我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每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个性。如果不时有人从旁提醒：“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无可替代的！”这该有多好！

同所有人一样，我也有讨厌我的人（我不愿把他们称作敌人，这太过分了！）。如果以为他们全都突然变成了我的忠实朋友，那就太天真了。不过，我过去和他们有过摩擦，彼此都弄得没趣。现在呢，我很容易宽宏大度地不去注意他们……

庆祝活动结束了，颂扬我的报纸也被人遗忘了，但欢乐依然存在。而我想，萦绕在我心头的这种欢乐之情，将温暖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三

过了一个月零几天。整整一个多月了！但我仍继续不断地收到贺信和贺电。分布在全国某些角落里的我过去的学生，居然得知他们的中学老师满六十大寿了！

一天晚上，我的桌子上亮着电灯。桌子一端放着几封信，

我不急于拆开来阅读。先得喝完晚间工作这碗“糊糊粥”，然后再来津津有味地吃这份“甜食”。

眼前放着一叠十年级学生的作文。

我教七年级至十年级的历史课。

我喜欢历史……我曾经怀着年青人的热情对待很多世纪前的古老事件。我对罪恶的斯维亚托波尔克^①怀有刻骨的仇恨，而对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②则敬崇备至。各个世纪都充满了我的朋友和仇敌。这种孩子式的偏爱，即使是声誉卓著的历史学家也往往难以避免。

我早已同罪恶的斯维亚托波尔克没有什么关系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仅仅是那个时代，那种遥远的生活和我们由之成长的那块土壤的一部分。如果伊凡·卡利塔^③是个高尚的人，他未必能够在鞑靼人的统治下建立起强有力的莫斯科公国。无原则的谄媚和不择手段的钻营，就是卡利塔的武器。如果卡利塔没有这套手腕，有谁知道鞑靼统治时期还会持续多久，而今天我们的俄罗斯又将是什么样子？

我爱历史的本来面目！不管我自己，不管国家和整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早已知道，历史上有过比这更严重的事，因而我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我爱历史，并使我的学生认真地，而不是孩子气地喜欢这门课程。

① 罪恶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约980—1019），俄罗斯大公，在争权中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兄弟，因而得到“罪恶的”绰号。

② 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生年不详，卒于972或973年），基辅大公。

③ 即伊凡一世（？—1340），卡利塔意为“钱袋”，是他的绰号。

他们应当每周写一篇作文交给我。出的题目可能很难预料。根据教学大纲,正在学1905年革命,而我却要求你写对伊凡雷帝^①的看法。你应当知道这场革命前几世纪中发生的一切,甚至还应当知道,似乎与这场革命毫不相干的东西。

人们认为我是个残酷无情的老师,但我不是吹牛,我敢说,我的学生们在历次考试中,总是以广博的知识使人惊讶不已。

此刻,十年级“甲”班的一叠作文正放在我的桌上。每篇作文在总的方面都老老实实在地肯定:“伊凡雷帝反对世袭大贵族的斗争具有进步意义……。”

下一本是廖瓦·波恰罗夫的作文。我不想隐瞒,我总是谨慎地等待阅读他的东西。

如果其他学生通常苦于缺乏天分的话,那末,廖瓦的不幸,却在于天分太高,在于他罕见的天分。当老师还在设法使全体学生理解讲课内容的时候,廖瓦已经闲得难受了。他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讲,不做家庭作业。他毫不害臊,甚至接二连三地得两分还得意洋洋,然后一使劲就胜利扭转了局面。他把这一手叫做“先净手赢法”^②。他为自己找到了有点下流的消遣:在家里阅读专门的参考书,然后在课堂上提出乍看起来毫无恶意的问題,把老师置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有的教师简直讨厌透了波恰罗夫,甚至发生过很不光彩的事:企图让他考试失败。但没有得逞。廖瓦·波恰罗夫与大多数学生不同,他象一个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的运动员那样喜欢考试。

① 即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为人残酷多疑,有雷帝之称。

② 指下跳棋时以先净手为赢的方法。

去年，波恰罗夫这种对学习毫不在乎的轻视态度传染了全班，于是纪律松弛，成绩下降。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廖瓦的双亲被叫到学校里来。母亲是秘书兼打字员，父亲是会计，他们俩都胖胖的，生性腼腆温顺，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掩藏的不安。有些人从不以思想的大胆惊人，从不因为精力过盛而胡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出人头地。廖瓦的父母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对我说了一些一般性的话：离毕业只有一年了，大学是进不了了……而我懂得了他们没有说完全的意思：“如果儿子不争气，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波恰罗夫的作文……这一次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伊凡雷帝反对世袭大贵族的斗争具有进步意义……”干巴，通顺，正确，但没有文采。

下面是卓娅·兹勃科维茨的练习本。怎么？……这个女学生一共只写了半页。

“当时(伊凡雷帝时代)有个传说：他(伊凡雷帝)抢走了一个司书的妻子……后来，他大概听说丈夫很不高兴，便下令把他侮辱的女人吊死在他家的门楣上，并下令将尸体悬挂两个星期；另一个司书的妻子被吊死在他的饭桌上”（H·科斯托马罗夫：《俄国重要历史活动家传记》，第1卷，第418页）。

“这种人不可能希望人们过好日子。如果他镇压了大贵族，那仅仅是出于狠毒。如果在他的时代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不是伊凡的功劳。”

就这些。

卓娅·兹勃科维茨，一个戴眼镜的不漂亮的姑娘，与波

恰罗夫截然相反，上课时精神集中，学习努力，文静孤僻，而……天分不高。

这番话出自波恰罗夫之口倒还可以，怎么竟出自她的口！……这真叫人不可貌相：“如果在他的时代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不是伊凡的功劳。”

而引证的又是科斯托马罗夫的话……

科斯托马罗夫是一心谴责伊凡·卡利塔不聪明、不够豁达大度的那些历史学家之一。却忘了，历史决不是依靠几个聪明人的努力前进的。

教员常常不得不进行自我斗争。看来，此刻我又面临着这样的自我斗争了。

我放下了卓娅的练习本……

那么，卓娅是照科斯托马罗夫那样思考的了。陈腐的观点。

如果你“不照我”那样思考，请吧，那是你的权利。但陈腐的观点不符合时代精神，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也许你会觉得，害处不大，应予原谅，甚至还应鼓励她的独立思考精神。但下一次，卓娅又会去挖掘某些发霉的见解，习以为常地吸收“不是我们的”观点。她的看法，她的思想，她的行动，就会开始与别人不一样。这就是说，成为一个与社会对立的人，就是说，逆潮流而生活。

某个教师的好心肠，通常会非常使人感动。虽然，一般地说，这对谁都不是秘密，教师的好心肠和随和是一种罪孽。

应当给卓娅打两分。明天应当在课堂上批评她，让她扎

扎扎实实尝尝滋味，以后不敢造次。让她委屈好了，决不能随和马虎！

但是……不是一篇，而是好几篇。

这样一来，不会打消卓娅对历史的爱好吗？……根据这一篇短文可以看出，她不只阅读教科书。这就是说，她有兴趣，这就是说，她喜欢历史。

这样一来，是否会引起卓娅的反感，只因为出于抵抗的心理，她将进一步倾向科斯托马罗夫，同你的观点相左？

但是，归根结底，这是科斯托马罗夫的过错，卓娅的过错只是偶然读了他的书。

自我斗争只进行了一分钟。这一分钟的斗争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和无足轻重，这也是个所谓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打两分还是不打两分？”这一分钟关系着一个人的命运！

我决定不打两分。我们明天进行讨论，弄清楚这个问题。

四

晚间工作的那份“糊糊粥”喝完了——作文批改完了。眼前是一叠信件。

有一封我已经看过了。它是和包着……一把海军短剑的包裹一起寄来的。唉，这是来自一个早已死去的人的贺礼。

我不认识的一位姓佩什涅夫的海军中校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这是布哈洛夫海军中尉曾经佩带过的一把短剑，他是我的朋友和您的学生。我已经把它保存了二十三年。说真的，现在我也舍不得同这件极其宝贵的纪念品分手。但是您培养和教育了格里戈里·布哈洛夫，而我的一切——我之所以还能活在此世，所以能成为一个战斗的军官——都应归功于他。归根结底，我应当感谢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表达我的谢忱，我只能舍弃我最要好的朋友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比亲兄弟还要亲得多。请您接受我和格里沙的……”

许多学生的名字我已经忘却。四十年里，我教过三千以上学生，怎么能全记得呢。格里戈里·布哈洛夫……格里沙，我倒记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卡拉辛诺村还没有打算建设成工人区哩。村道上有个孩子，戴着一顶乱蓬蓬的皮帽，流着鼻涕，穿着两摆拖地的破外衣，脚上是一双穿坏了的大树皮鞋。人们瞧不起这个孩子，他是浪荡女人莫季卡的儿子，不知道父亲是谁。莫季卡到木材流放工人那里当厨娘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农村孤儿只配当牧人的副手，放牛放羊，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我不可能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学校里，让他坐在课桌旁，然后在普及教育的花名册里写上一个名字。应该让这个小家伙洗洗脸，洗个澡，给他一点衣服和鞋子，给他找个住处，让他吃饱肚子，这样他才不会重新变野，才能坐下来用功

读书。

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妻子已经怀孕。我们住在别人家的木房里。但妻子比我更早产生了对这个孤儿的怜悯心。于是我们就收养了格里戈里·布哈洛夫。

“你们白白照料我。我是个被诅咒的人，反正得放羊。”

这个“被诅咒的人”当时还不满九岁。

冬天，我送妻子去分娩，回来的时候，格里戈里不见了，跑了。人们在一个遥远的村子里发现了他。他靠挨家挨户讨饭过活。

“你这是干什么？”

“现在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你们还有什么用？”

过了两年，邻区奥毕耶得科沃村，把过去一家地主庄园改建为区联合孤儿院，格里戈里坚持要我们把他送到那里去，我们家里也即将诞生第二个女儿了……

他长成了漂亮的小青年：红润的脸蛋，乌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性格热情而容易冲动：“我是个被诅咒的人”，天哪！这是多么遥远的事……

还在战争爆发前，他应征去海军服役。战争时期他已经当了快艇指挥员。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他击沉了敌人的几艘运输船。弹片炸掉了他一条胳膊，但他仍然沉着指挥，直到把快艇撤出敌人的炮火，救出了全艇船员。而他自己被抬上岸时已停止了呼吸。死后追授他苏联英雄称号。

现在，我们学校里的少先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活动室里挂着他的照片：带“蟹”章的海军大盖帽，一张

年青、端正、静止不动的脸庞，热心的修版工人使这张照片失去了某些与生前的格里戈里·布哈洛夫相似的痕迹。

我从抽屉里取出了海军佩带的短剑。

细长的剑鞘上紧紧地镶着几个铮亮的黄铜箍。粗大的剑把上有亮晶晶的小点，那是几颗铆钉。握着剑把一抽，镀镍的剑锋就闪耀在灯光之下了。这毕竟是武器，而不是满足男子虚荣心的漂亮装饰品。短剑看上去很新，象是刚从兵工厂里制造出来的。也不知二十五年前牺牲的格里戈里是否佩带过？何况，这是隆重场合用的武器，本来就很少佩带。

我没有亲身参加战争，没有听说过子弹的啸声，也没有蹲过战壕。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发现是平脚。尽管我现在已是花甲之年，我的不正常的双脚仍在忠实地为我效劳，我依旧步行去学校，只是步伐显得沉重一些罢了。但当初我没有被批准参军，我不适合从事队列勤务。和平时期固然不适合，但战时就不一样。军事委员部的体检委员会决定派我去建设营。

而我当时刚刚担任校长职务。区教育局长上前线了，除了我，没有人可代替他。区里需要我，所以没让我去挖地洞和搬运木头……我没有听说过子弹的啸声，没有看见过人们在战场上是怎样牺牲的，但我，恐怕比谁都更经常听到牺牲的不幸消息。

一听到被打死者的名字，我总会立即回想起坐在课桌后面的某个男孩子，回想起某个头发蓬乱的或是理短发的，活泼的或是腼腆羞涩的，刻苦认真或是吊儿郎当的男孩子。